



世纪文库

欧洲的哲学影响对中国

朱谦之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哲学对 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5756-7

I. 中... II. 朱... III. 哲学-中国-影响-欧洲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5511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何晓涛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4

字 数 296,00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756-7/B·480

定 价 34.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睿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睿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浩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势而为，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序一(朱杰勤) / 1

序二(黄心川) / 5

前言 / 9

前论

第一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 / 25

一、 文艺复兴之物质条件 / 25

(一) 造纸 / 28

(二) 印刷术 / 29

(三) 火药 / 30

(四) 罗盘针 / 31

二、 文艺复兴期对于中国之认识 / 33

(一) 教士 / 33

(二) 商人 / 37

(三) 外交使者 / 38

(四) 游客 / 39

(五) 工程师及其他 / 39

三、 《马哥波罗游记》之影响 / 39

(一) 地理上之大发现 / 40

(二) 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 / 43

(三) 自由研究之精神 / 49

四、 文艺复兴期之中国题材 / 51

(一) 绘画 / 51

(二) 文学 / 52

(三) 科学 / 54

第二章 18世纪中、欧之文化接触 / 55

一、 中、欧文化接触之三时期 / 55

(一) 物质的接触时代 / 56

(二) 美术的接触时代 / 60

(三) 思想接触的时代 / 71

二、 耶稣会 / 92

(一) 耶稣会小史 / 92

(二) 耶稣会士东渐始末 / 95

三、 西学东渐之初期 / 105

(一) 天文学 / 109

(二) 数学 / 111

(三) 地理学 / 113

(四) 物理学 / 114

(五) 气象学 / 115

(六) 生物学 / 115

(七) 生理学 / 116

(八) 医药学 / 116

(九) 语文学 / 116

(十) 哲学 / 117

本论

第一章 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 / 127

一、 礼仪问题与耶稣会士之态度 / 127

(一) 所谓礼仪问题 / 128

(二) 耶稣会士之态度 / 129

(三)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 132

目 录

- 二、耶稣会士之孔教观 / 138
 - (一) 孔子哲学的优越性 / 139
 - (二) 孔教与基督教之一致说 / 140
 - (三) 六经上帝与天即主宰说 / 143
- 三、反理学之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 146
- 四、反理学在中国所生之影响 / 168
 - (一) 正面的影响 / 168
 - (二) 反面的影响 / 173

- 第二章 中国哲学与启明运动 / 187**
 - 一、所谓“理性时代” / 188
 - (一) 反宗教的哲学精神 / 189
 - (二) 希腊呢？中国呢？ / 193
 - (三) 宋儒理学传入欧洲的影响 / 199
 - 二、启明运动之先驱——笛卡儿 / 205
 - (一) 笛卡儿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 / 205
 - (二) 笛卡儿学派的中国哲学观 / 207
 - (三) 麦尔伯兰基论“理”与“神”之异同 / 214
 - 三、莱布尼茨与宋儒理学之关系 / 219
 - (一) 莱布尼茨之中国文化观 / 222
 - (二) 莱布尼茨之宋儒理气观 / 240
 - (三) 莱布尼茨之影响——沃尔弗 / 246

- 第三章 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 / 253**
 - 一、哲学与大革命 / 254
 - (一) 大革命的历史观 / 254
 - (二) 在哲学旗帜下之革命家 / 259
 - (三) 大革命之哲学基础 / 263
 - 二、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思想的关系 / 266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一) 所谓“百科全书派” / 266
(二) 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思想的接触 / 267
(三) 百科全书派之中国文化观 / 270
三、重农学派 / 303
(一) 重农学派之中国思想影响 / 304
(二) 欧洲的孔子——魁奈 / 307
(三) 杜阁 / 319
(四) 余论 / 326
第四章 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 / 327
一、德国古典哲学之革命的性质 / 327
(一) 哲学革命的意义 / 327
(二) 哲学革命与政治革命 / 332
(三) 中国思想对于德国文学的影响 / 336
二、古典哲学与中国文化 / 341
(一) 古典哲学之代表人物 / 341
(二) 黑格尔之中国论 / 345
三、叔本华之中国文化观 / 350
(一) 《自然之意志》中所见之中国文化 / 350
(二) 儒、释、道三教评 / 351
(三) 叔本华所受朱子哲学的影响 / 352
简单的结论 / 354
译名对照 / 363
编后记 / 371

序 一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是朱先生精心结构的一部著作。此稿草创于1936年，告成于1938年，终于194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给以高度的评价。新中国建立后，朱先生目睹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伟大的中国文化遗产受到全世界有识者的重视，中西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扩大，朱先生想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来发扬中国文化，从而说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他于是决心把《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用新的观点、方法加以补充修改，改题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重新出版，以广流传。他为修订此书付出很大劳动，自称在一生许多著作中，此书还是较称意的。

根据社会科学分类，此书是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即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近百年来，国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多注意于中外史地考证问题，虽然有些学者接触到18世纪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经过，但也只涉及美术、文学、园林建造、漆器和瓷器的外传。可是朱先生之书以偌多篇幅专门论述18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并结合法国革命与德国革命来谈，这还算是别开生面的巨著，值得称道。

此书分为前论和本论两部分。前论谈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和

18世纪中欧文化的接触，本论才是关于中国哲学对西方的影响。这种安排在体例上是恰当的。作者在前论中，举出我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作者能够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关于火药这一段话来说明资产阶级利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来攻破封建堡垒和消灭封建制度的作用。可见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各种问题。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427页）马克思这一提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对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的条件，而且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换一句话说，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和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由此可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所以能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我们应该引以自豪。全世界都知道四大发明，有关著述也不少，但考虑到它们的社会效果，迄今尚寥寥无几。朱先生论述四大发明时，提到它们给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条件，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实以耶稣会士为媒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中一件大事。关于耶稣会士的性质，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经过及其作用等问题，都是研究中国史及世界史者不容忽视的。朱先生对耶稣会士的分析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他还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生平、专长和作品逐一介绍和评论，对研究耶稣会的学者帮助不少。我们从《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一章，可以窥见他们对宋儒理学的态度和意见，以及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正反两面的意见，有利于我们对此作比较研究。天主教各教会内部争论的“礼仪问题”，关系到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手段和方式，这个问题引起中外

长期的争论，其争端集中于三点：（1）敬祖之礼；（2）祭孔之礼；（3）祭天之礼。换言之，即奉祀祖先牌位是否为宗教仪式？祭祀孔庙是否只为敬孔或含有异端的宗教意义？以上帝二字和以天字称呼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否恰当？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人尊孔敬祖先与崇拜偶像不同，对教徒可以采取放任态度，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两派就提出反对。耶稣会士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调和的。大家争论不休，就向罗马教皇请示，教皇先后派钦差铎罗（1704年）、嘉乐（1715年）来华查办。终于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下谕：凡礼拜祖者不许吸收入教。这样就触怒于康熙帝，他批示：凡不许尊孔敬祖者就不准在华传教。因此传教事业不能发展达一百二十多年。本书对礼仪问题的争论，均有详细的交代和精辟的见解。故可喜。我们认为，礼仪问题的争论，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礼制和风俗习惯的注意和研究，自是一件好事；因而导致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几乎中断，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17、18世纪欧洲发生一个启蒙思想运动。启蒙思想重视理性，主张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提倡平等，要求法律公平。他们攻击旧制度下的专制政治和阶级制度，攻击罗马公教教会并批评在教会的精神支配下社会的愚昧和迷信。有些启蒙思想家还主张改变政体，但多数人希望有一位“仁君”，开明专制君主出现，自上而下，实行改革，实现启蒙运动思想。

启蒙运动大师如伏尔泰、莱布尼兹、揆内及百科全书派等人，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认识中国和孔子。在他们的著作中，表扬中国文化，称道中国的“仁君”和“仁政”，以及儒家以德教人的伦理思想，主张欧洲以中国为榜样，借此来批判旧制度下的欧洲政府、教会和社会。事实证明，18世纪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中国有许多方面是胜过欧洲的，朱先生在书中已经把启蒙大师关于中国的文物制度，特别是哲学思想的言论介绍出来，略加评论，大致不差。启蒙时代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极盛时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件承先启后的大事，今得朱先生表而出之，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它的思想来说，不能不说与启蒙运动有关，而且会受到中国思想的间接影响。但中国的影响是外因，而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广大人民的阶级斗争思想才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者认为“受了中国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影响的百科全书派，结果竟能应用中国思想以打倒路易王朝，发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提法值得商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自由平等的斗争口号的提出，不完全受中国影响，同时也受到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人民自有他们的传统革命思想和爱国思想来发动这次革命。

朱先生博及群书，对于哲学、历史和中西文化均有湛深的研究，著作亦多，其中已出版的如《扶桑国考证》、《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的影响》和《中国景教》，都是中外关系史中有独特性之作。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这一课题，要求高、难度大，非掌握中西有关资料，博通中西文化知识者无从着手。而朱先生胸有成竹，奋笔直书，二三年间就完成此书的初稿，犹自视慊然，晚年又反复修改补充，勒成新本。为以后研究中外关系史者导乎先路，虽有小疵，无伤大雅。我们认为朱先生撰述此书，固然有追求真理，承先启后的目的，但亦有表彰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从而激励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微意。这又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迄今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用新观点写成的，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有独到之处的中外关系史。这与我们 10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很不相称。这个学术上的空白，应该由我们迅速补填。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虽然是中外关系史一部分，但仍不失为内容丰富，成一家言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定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填补这个空白之功。广大读者一定以先睹为快。

朱杰勤

1983 年 10 月 3 日于广州暨南大学

序二

朱谦之（1899—1972年），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生于一个数代从事医生职业的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继母抚养成人。民初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就读，在中学时已经熟读古代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记》等小册子。17岁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亲聆学界名师教诲，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先后发表了《周秦诸子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文。

1919年中国大地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朱谦之满怀革命激情投入到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参加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编辑杂志，撰文抨击时弊，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翌年，又首次在国内报刊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等口号。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曾与朱谦之讨论过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同年10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方获得释放。

* 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编者

1921年朱谦之离开北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求教。因不满意佛门的腐化、偷安生活，复断绝关系，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越三年，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1924年辞职再度隐居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逋^{*}的故居，悉心著述。1929年获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潜心历史哲学的研究。两年后回国，任暨南大学教授。从1932年起，朱谦之先生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历史学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历尽艰辛，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曾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出资筹办《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研究的“考今”工作起过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把中山大学历史系办成了一个著名学系和研究机构，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理论干部。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朱谦之回到了久别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8年后又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对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4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全体人员并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朱谦之担任了研究员。尽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但仍著述不止，致力于宗教学的研究。1972年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5岁。朱谦之一生著述等身，给后人留下了庞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他撰写了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

朱谦之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化、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

* 即林和靖。——编者

** 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编者

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至今还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因之他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善于用脑和手，每读一书，必不停地用朱笔圈点和摘录。在着手课题研究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的书目。他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十分注意，所以能够尽快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研究成果，步趋世界学术研究的潮流和开拓国内研究的新领域。他的国学底子深厚，知识广博，文理并茂，他写的《老子校释》序言，其辞藻之华丽，章句对仗之工整，用典之殷切，虽辞章学家犹不过也。

这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朱谦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据我所知，此书可以算作他的最得意的著作，当然更是功夫下得最大的一部书稿了。他在生前曾对我说过，他写作此书一共花了40年的时间。1940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本书的最早的版本，却是他一直不满意，致力于重新修订和充实。1958年他自认为可以重新出版，并把书稿交给商务，商务也于1962年排出了铅样本，但随着“左”的思想抬头，此书最终在商务也未能印刷。为此朱先生在临终弥留之际，为此书不能面世，而落泪不肯瞑目。朱谦之先生的夫人也曾讲过，朱先生把此书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要。抗日战争期间，他专门做了一个口袋，将此书稿放在里面。每当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时，他别的不拿，只将书稿带在身边。由此可见此书的完成和出版之艰辛不易。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本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还包含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孜孜不倦的事业追求和一片求取真理的痴心，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提倡的精神！

1978年中国大地迎来了春天，社会科学研究开始繁荣，此书的出版终于有望。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关心下，1985年此书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并且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惜由于印数太少，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1999年此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现在又由世纪出版集团再次加以出版，我想将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了。

在此代表朱先生的夫人何绛云女士对出版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